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劫后反思】	我们差他们一个道歉	陈 全
【往事非烟】	我的北大故事	郑斯宁
【亡灵祭坛】	1966“8·18”：北京城死了多少教师？	王培尧
【研究评论】	文革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下）	杜钧福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劫后反思】

我们差他们一个道歉

· 陈 全 ·

我从小生长在桂花园的红房子，这是当时的（重庆）市人委宿舍，共有四栋，我家住在一栋一楼。我们一楼的公共厨房也是整栋楼的信箱，我每天放学后就为各家送信，所以熟悉楼上楼下的爷爷们，自然我成为了受欢迎的娃娃。这些市人委参事室参事爷爷们都很有文化气场，走路挺胸收腹，待人接物风度翩翩，所以红房子的娃娃们在一个生机勃勃的环境下成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突然一天整栋楼的爷爷们被拉出来站队，一夜之间所有的起义军人参事顿时都成了国民党反动军人，每个人低头挂着反动军人的牌子，每个家庭都被抄了家，财产遗失，而不敢乱说乱动，所有的家属都处于惊慌失措和惶恐之中，一片混乱。怎么这些和蔼可亲的老爷爷们就成为了反革命呢？课本上讲的国民党不抗日，专门屠杀共产党，抗战的是八路军、新四军与他们没有关系。仇恨代替了敬畏，于是反动的老爷爷们开始在地段上劳动改造做清洁。

灾难起于1968年9月，楼下做清洁的老爷爷一天天少了起来，原来是重庆市革委会管训队深挖“武斗黑手”，编造了所谓的“反到底派黑高参团”和“反革命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炮制出重庆文革“一号专案”，即所谓《“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嫌疑案》。

9月14日开始大逮捕，对于“残渣余孽”的参事们被要求一网打尽，关进管训队。

最早被带走的是住在二楼的邓开经的爸爸邓翰（原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少将师参谋长），我最喜欢为他送信，因为可以获得坐一下他房间里皮沙发的机会，这使我很长见识，这在红房子是唯一的。那天户籍给他送来了通知，叫他去区革委报到参加学习，充满着革命热情的邓翰高高兴兴地去了。他的夫人丁世英送他到区委，一看坝子里站满了地富反坏“牛鬼蛇

神”，马上感觉到情况不妙，多半是凶多吉少。为什么第一个带走邓翰呢？是因为邓翰虽然只是个少将，但他是军阀邓锡侯的堂弟，他个头大身体魁梧，声音洪亮，两派武斗开始，作为职业军人的他很激动，自台儿庄血战受伤之后，他就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战事了，于是他忍不住到大田湾体育场附近去看造反派体委井冈山战士们修筑阵地，他发现他们太业余了，率性指点了他们几下，结果他的激情和军事本领为他引来了杀身之祸，因为后来解放军接管后54军的一个干部发现这阵地如此专业怎么可能是造反派娃娃们修筑的呢？于是报告了市革委，最后查到他。管训队严刑拷打之下，他不得不承认“反革命组织国民革命军的活动”，后来据说是被管训人员一脚踢到厕所里脑溢血死亡，通知邓开经去为他反革命爸爸收尸。

一个傍晚我看到坝子里开来一辆嘎斯六九吉普车，几个军人从三栋押出戴着手铐的赵援（原国民党中央军第一二四军中将军长、九江防线白崇禧的参谋长），记得他的儿子赵中山从后面追上去为他披上了一件呢子军大衣，这件军大衣曾经相伴他的军人生涯，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赵援毕业于黄埔二期，他几乎参加了所有国军抗日正面战场的大会战。

之后逮捕行动全面铺开，老爷爷们被悉数归案，其实论年龄你就是让他们跑也跑不掉的，更何况他们是一批历经战火临阵决不言逃的军人。他们是红房子三栋卿光亚的爸爸卿云灿（原国民党七十二军副军长），他正好60岁；我的隔壁邻居已经76岁的吕康（陆军少将，川军将领），率军参加台儿庄，负重伤抬下；我们一栋三楼吴帮诚的爸爸吴克雄（原国民党中将高参），已是75岁；四楼陈道正的爸爸陈希武（原国民党国防部部员、国民党军第三十军三十师少将副师长）；三楼黄小仁的爸爸黄以仁（原国民党军二十四军刘文辉部将领，炮兵团长）；杨乃家的爸爸正好80岁的杨学端（原国民党军二十四军西康军管区少将司令，红军长征抢渡大渡河时驻防大渡河边的第五旅旅长）；以及二楼的其他国民党将领陈先器、郭崇皋等都陆续被通知进入了学习班。唯有我家楼上卢光谦的爸爸卢继东（原国民党军统云南站副站长），那年仅为55岁，继续在参事室上班，也惶惶不安，安排后事，准备自杀，直到林彪9·13事件爆发而躲过一劫。

红房子的老爷爷们都进了学习班，各家各户都在打听管训队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们去送生活用品，没有音讯，老婆婆们也只有夜晚串门相互安慰，听天由命。最后大家害怕接到通知，因为都是去收尸取遗物，老爷爷们一个接一个的死去了，楼上楼下的邻居们一家接一家的去石桥铺火葬场，如同犹太人消失在二战时期的德国一样，更恐怖的是没有眼泪，看不到悲伤，家属都平静地接受了死亡。反法西斯的勇士又亡于另一个法西斯的血腥。

最悲惨的是赵中山几兄妹先去火葬场送了父亲赵援，没有多久又送走他母亲，之后又送走他被枪毙的反革命弟弟。

这些抗战将领曾经九死一生，血战沙场，最后却死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会战。幸运的卿云灿活到了1994年，卢继东还更活过了九十高龄。

而今桂花园的红房子早已消失，邻居们都天各一方。很多年过去了，每当读起抗战的书籍，看到抗战的纪录片，红房子楼上楼下的老爷爷们的面庞都会浮现脑海，让人难以入眠。

我至今都还记得只有红房子的娃娃们才会唱的那歌：

军长嘛师长嘛练操法 /
吹起嘛军号是哒卞里卞哒卞里卞哒哒齐把枪放下 /
左右要看齐行列要整齐 /

我的同胞们大家一条心 /
杜鹃哟发咪发啦索 /
朵软芮咪纳索 /
朵软芮咪纳索 /
草鞋皮鞋草鞋皮鞋草皮鞋 /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右脚 /

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这是川军的军歌，就是这些老爷爷们及几十万川军将士当年唱着这支歌出川，走向淞沪战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再也没有回到家乡。

今年举国上下庆祝抗战胜利 70 周年，而红房子曾经的抗战将领们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们的儿女也都到了他们父亲被关进了管训队的那个年龄。这些年，我不时看到报道说当年红卫兵小将给老师道歉，给走资派道歉，就是没有看到谁给这些国民党的抗战英雄们道个歉，但他们至少是应该得到一个道歉的。

1949 年新政权成立后，进行了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但是在这场镇反运动中，国民党军在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被俘、退役返乡、闲居或从商的高级将领绝大部分遭到枪杀、关押，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株连。这些被杀的 242 名民国高级将领中，其中上将 5 名、中将与辛亥元老 5 名、中将 78 名、少将 159 名。这些被杀的 242 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中几乎全部参加了八年抗日战争，其中不少高级将领都是抗日名将，民族英雄。

赵援，重庆长生桥人，黄埔二期，原国民党中央军第一二四军中将军长、九江防线白崇禧的参谋长卿云灿，黄埔六期，原国民党七十二军军长吴克雄，原国民党中将高参

□ 来源：微信号《风中影像》

~~~~~

## 【往事非烟】

### 我的北大故事

• 郑斯宁 •

#### 1，北大梦

我 1946 年 11 月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郑汝骊 1936 年考入燕京大学，七七事变后转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1940 年毕业，其同班同学包括唐敖庆、朱汝瑾（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之父）等。母亲张翼仲 1944 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抗战期间迁至四川乐山）。抗战胜利后，他们在陪都重庆结婚，证婚人为文化界名人曹靖华和钱歌川，由郭沫若先生题写婚书。1949 年他们应聘从杭州来到东北大学（今东北师范大学），我也随之在东北师大幼儿园、附小、附中接受一条龙教育。科学家是我最崇尚的职业。当年父母就是抱定“科学救国”进大学的，我也从小立志献身科学。北大拥有西南联大 DNA，院系调整后迁入燕大校园。到父亲曾经就读的北大校园读书，成为我中学时代的梦想。1965 年高中毕业，顺利考取北大数学力学系。同班还有刘智、徐力生、赵忠文分别考取北大物理系、技术物理系和历史系。外班也有多人考进北大，包括考取西语系的关立新。

1965年9月开学，立刻感受到超强教师阵容。数学分析课的三位主讲老师是大数学家闵嗣鹤、冷生明和钱敏。闵、冷为一、二级教授，当年陈景润的论文就是闵审阅的。钱在北大数学系则以博学著称。如此三位大数学家上一年级数学分析课，今天已无法想象。我们两个力学班由钱老师教。他知识面广，高屋建瓴，重视物理背景，还常举数学物理方程等后续课程的例子，并不时提醒常见错误。文革后的1979年，钱敏与丁石孙竞争破格评教授。数学系只有一个指标，但教授们推荐了丁、钱两个人。丁回忆说：“就提教授之事，钱敏有一天来找我，说我做的研究工作比较少，应该让他先提。我答应了他。”后来学校还是提了丁石孙。丁说：“这次钱敏只提了副教授，很有意见，当场就把提为副教授的聘书扯了。”（《丁石孙访谈录》，第164—16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钱老师的传奇之一是他退休后，仍三次指导学生获全国百优博士论文。他自己则于2013年获中国数学最高奖——华罗庚奖。给钱老师助课的是一位女老师潘文杰。她本科1954级，程民德先生培养的函数论方向研究生，其《傅里叶分析及其应用》一书，至今仍被用作北大高年级傅里叶分析教科书。教我们解析几何与高等代数的，是几何学大家吴光磊教授，尤承业老师为其助课。吴老师讲课条理特别清晰，语言干净利索，没有一句废话。还略带一点东北口音，使我感到亲切。几十年后看到丁石孙对吴先生的讲课评价：“吴光磊先生讲课讲得非常好，可以这么说，他在数学系课讲得好是数一数二的。我1949年选吴先生的课，至今还记得他讲射影几何，如何从几条简单的公理，推出域的概念。那时我就发现吴光磊先生讲课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简练，思路非常清楚，学生很容易接受，也很容易记，而且记得很牢。1960年学校组织批判所谓学术权威，经领导研究，批判的对象是吴光磊先生。一开始大家还不理解，为什么要批判他。当时有一个奇怪的逻辑，说吴光磊课讲得太好了，太好了就必须批判，批判了才能使他知道怎么再进一步更好。”（《丁石孙访谈录》，第28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尤承业老师对中国拓扑学发展有很大贡献。他编写的《基础拓扑学讲义》是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拓扑学教科书，凡中国数学家，无人不晓。尤老师还是我的班主任，朝夕相处，感情深厚。2010年5月我们数力系1965级毕业40周年的燕园聚会，邀请尤老师参加。见面时，我问他是否还记得1966年春我们最后一堂高等代数课讲到什么地方。师生二人在各自经历了几十年人世沧桑后，关于最后一课内容的记忆竟完全重合，是“向量组的线性相关与无关性”，令我感慨不已。由于文革的政治运动原因，钱、吴两位大家的课，只上了不到一年，但这些与中学完全不同风格的课，以及贯穿始终的严格逻辑推理，给我打下极为深刻的烙印，也成为我后来继续自学，最终走上数学研究之路的宝贵起点。

文革前的短暂学习，正值大好青春年华。数力系的学生都是带着数学、物理高分入学的。钱敏老师的点名册用心标记了每位学生的数学、物理高考成绩，常感叹我们基础好。学生的表现机会只有每次习题课的“提问—作答”环节。有一次尤承业老师代潘老师上数学分析习题课，关于内容稍微超前的“某微分元的刻画”，点名提问一贯自信的翁天祥同学。翁天祥没有答上来。我马上举手，给出精准解答。这段小小花絮成为翁同学的心结，几十年间被他多次提起。2016年2月，我们在美国加州Diamond Bar相见，他又重提这段往事。尽管对当初那个小问题到底是弧长微元还是体积微元的具体细节尚存分歧，但毫无疑问的是：它已作为我们北大求学经历中的珍贵片段，留在了各自的记忆里。

200号是北大昌平分校的简称。1965年已竣工一座教学楼和图书馆，四栋学生宿舍，还有标准运动场和游泳池。200号远在北郊，在那里称燕园为南校。数力系最先搬到200号，1965级新生在南校报到后，被直接拉到这里。老师到200号上课，总要提前一天从南校乘班车赶来，先在学生宿舍楼住一个晚上。这个与世隔绝的幽静校园，太适合读书、做学问了。可惜当时已不是读书、做学问的大气候。陆平校长给新生做报告，进行入

学教育的调子很低，感觉怪怪的。后来才知是因为北大刚搞完四清，他被整得灰溜溜。系主任段学复对新生讲话，重点大谈理论联系实际之类，还自我反省说：“我是搞群论的，却不知道群有什么用。想问群论怎么用，得找吉林大学唐敖庆。”

1966年6月从汉中返回北京，依然是回200号搞运动，直到7月中旬张承先工作组失控大局，才统一撤到南校（燕园）。两段合计，在200号待了整整8个月。

### 3，汉中岁月

我的北大经历还有另外8个月是在汉中653分校度过的，分别是1966年4月到6月，以及1969年10月至1970年3月，前后两段时间。

1964年10月中央为战备需要，决定把北大理科的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及数力系力学专业搬到三线，成立分校。周培源副校长到汉中选定褒城附近的716亩地作为校址。1965年2月开始测绘，4月开工修马路，6月动工盖房子。简称北大653分校。1966年3月16日黄一然副校长召集我们两个半系的65级学生作动员报告，告知要预支我们教学计划中的生产劳动时间。3月30日，一行300余人登上西去的列车。离653最近的火车站是宝成铁路的阳平关，只停4分钟。3月31日凌晨，300多人一齐下车。经事前演练，还算顺利。下车后乘解放牌货车到达653时，已近天明。稍事休整，第二天就投入建校劳动。新校址在“连城山”山麓，坡度8%，没有完整的平地，落差大的地方需要用大石块砌成护坡。跟盖房子相比，这个活儿属纯体力劳动，技术含量不高，最适合改造思想。工地为军事化管理，按连队建制。一、二连为复转军人。我们力学两个班编为三连一、二排，无线电系、技术物理系分别为四连、五连。专业课、专业基础课都停了，只保留了外语课。北大1965级理科的外语都改学英语，唯独力学专业学俄语，据说是因为苏联力学（含航空航天）不错。随我们一同来653的俄语老师叫朱耆泉，个头1米8，白白净净的上海人。两年后清队刚开始不久，就听到朱老师自杀的消息，非常困惑：一个年仅三十岁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会有什么问题呢？很多年后才听说他因私下有过批评林彪的言论，被指控“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按现行反革命批斗，走上绝路。朱耆泉的父亲和伯父分别是曾任上海交大校长的朱物华和文学家朱自清。

我在班上担任团支部宣委，建校劳动的宣传 work 相当繁忙。我写过一篇题为《要痛苦地磨练自己》的心得，苦行僧似的改造思想，在工地广播台反复播出。

那段时间的大事是批判“三家村”，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还算平静。1966年6月1日晚间，“第一张大字报”一广播，653就炸锅了。我们入学不到一年，顿时被新概念“陆平黑帮”搞懵了，甚至怀疑起身边的辅导员。第一次自发的批判会发生在6月11日晚的乙型楼前。场面很快失控，出现人身侮辱，令我极其反感。我从此远离任何批斗活动。

那段汉中岁月的最大收获是在附近的褒河学会了游泳。五月的褒河水深浅适宜，仅仅下水两三回，就忽然找到浮起来的美妙感觉。以前在游泳池也曾学过多次，却始终不得要领。这以后不久，就实现在颐和园横渡昆明湖了。从此，游泳成为我之最爱，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轻易放弃任何可游泳的机会，包括1970年代在辽北东嘎水库及二道河，1980年代在大连南海头天然浴场，1990年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露天泳池，以及必将陪伴我终生的大连理工大学游泳馆。

第二次去汉中是1969年10月“一号通令”下的战备疏散。北大两个半系的师生，在工军宣队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开进653。由于文革浩劫，三年多前那个“富庶汉中”没

了踪影。物质匮乏，食堂见不到“荤腥”。每天的主题仍然是建校劳动。我们班与固体力学教研室的老师编在一起劳动了五个月，学到许多东西，也结下了友谊。至于所谓“斗批改”，到底做了些什么，已全无印象。

1970年在653集体过春节，自己动手在食堂包饺子。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大显身手，自豪了一把。没几天就迎来毕业分配。我在《告别未名湖2》中的《教坛耕耘琐记》一文曾这样描述那段经过：“工、军宣队一手操办，速战速决完成毕业分配，把我们发落至天南海北的最底层。没有志愿，没有选择，只能从命。原则简化为‘就近’。我们班五个东北人全部打回东北：我是吉林考生，吉林名额太少，分到与吉林省接壤的辽宁省昌图县。另一个吉林人邓贯瀛去黑龙江伊春。辽宁人王燕庭、孙贺琦和朱永成，分别去辽宁开原、铁岭和新宾。江浙、上海没有名额，上海同学大都发配贵州山沟。北京同学主要去向为‘三北’（西北、华北和东北）农村。当时汉中还不通火车，只能分批运送到宝成铁路沿线的阳平关或略阳。东北、贵州离汉中最远，也就头一批上路，解放牌敞篷卡车拉我们到三百里外的秦岭重镇略阳。我站在略阳天桥遥望绵绵秦岭，感慨万千：1965年我从东北师大附中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时，曾满怀壮志和理想。读书不到一年就遭遇文革。遵照最高指示折腾了四年，就这么被打发了，连个文凭也没有。十年后的1980年终于拿到文凭时，已过而立之年。后来我多次跟我的学生调侃说，我的北大文凭是假的：基本没读书，只有一个学期的成绩，拿不出成绩单来。”

#### 4，炮打中央文革

1966年6月回到北大200号，7月集中燕园不久，就亲历了中央文革7月25、26日和8月4日在东操场主持的关于工作组问题的三场“辩论会”。那其实不叫辩论会，主持者一边倒，只给反工作组的发言鼓掌。中文系李扬扬的发言，说工作组的问题性质是延安，不是西安，引起许多师生共鸣，掌声极为热烈。我也鼓了掌。李是我中学的高班学姐，故尔印象格外深刻。但台上的中央文革成员完全无动于衷。他们哪里是来北大调查研究？分明早已预设结论，全然不顾“主持人中立”的基本规则了。7月26日的辩论会逐渐演变成对张承先的批斗会，康生念了一个质疑主持人的条子：“你们是干什么的？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警告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的。”他念罢勃然大怒，叫号写条子的人站出来。散会后，睡在我下铺的王进慧同学情绪低落，才知道条子是他写的。全班同学没有扩散消息，默默地掩护了他。

中央文革小组给工作组过早定调，匆匆赶走工作组。北大广大师生认识不统一，阵线不分明，陷入混乱状态。对此，我与同班王燕庭、孙洪修议论过多次。8月下旬，我们决定写一张大字报，表达看法。大字报标题为《中央文革包办代替，给北大运动带来后遗症》，观点鲜明：中央文革反工作组的理由是工作组包办代替，束缚了群众手脚。而他们自己反对和撤销工作组的做法本身，同样是包办代替，而且后遗症严重。文章难免嘲讽味道，为吸引眼球，在标题末尾的“后遗症”三个字周围还用漫画手法点上了若干麻点，比喻天花的后遗症。大字报署名“亦工亦农亦军”并标注作者29楼宿舍号，晚饭时分贴在29楼到小商店之间的大字报棚，是接近“三角地”的醒目位置。岂料当夜一场狂风暴雨，清早醒来，大字报首页已被吹落，不知去向。很快就有人议论说我们犯了大忌。王燕庭随即把大字报底稿撕碎，借29楼四楼厕所便池下水道冲走。其实，我们态度诚恳，语气平和，给中央文革提点意见而已。但那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年代，想扣个“炮打中央文革中央”的罪名绰绰有余。撤工作组是毛主席的主意，而反中央文革按“公安六条”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任何不测之事，都有可能发生。幸亏我们班同学比较温和，而且分派后王燕庭属新北大公社，我和孙洪修属井冈山，客观上也互相保护了。如今这段故事成为光荣史，敢质疑中央文革确实不容易。但我们无意给自己贴金，否认造反。王燕庭调侃说：“顶多算跪着造反吧”。“炮打中

央文革”事件使我们结成生死之交，后来每次班级聚会，我们三人都要合影再合影，留念再留念。

文革是血腥的，很多人没有我们那样幸运了。仅数力系，就有四名教师先后自杀身亡。1966年7月27日，也就是中央文革为“6·18事件”（完全失控的38楼前大规模“斗鬼”活动）翻案，撤工作组第二天，董怀允老师上吊自杀，成为红色恐怖的牺牲品，北大文革的第三位殉难者。1968年工、军宣队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开始，重点是抓叛徒、特务。凡与美国、苏联有过瓜葛的人都倒霉了。不久就有董铁宝和张景昭因“美国特务”之罪名自杀。董是从美国归来的教授。张则是昆明西南联大时代杨振宁父亲杨武之的学生，也是杨振宁的初恋情人。她在北大教公共数学课，被公认课讲得好，深受学生欢迎。罪名是给美军当过翻译，自杀时年仅49岁。其实，二战时期美军是盟军，帮中国抗战的。张景昭作为杨振宁初恋情人的身份，是杨本人几十年后在自传中披露。除了讲细节，杨还提供了当年张的照片。（江才健《规范场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第38—39页，广东经济出版社，2011。）第四位自杀者是与同住29楼四层的青年教师陈永和，因为在桥牌桌上议论时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跳楼自杀。工军宣队认识到自杀问题的严重性，很快加紧了对于被审查对象的看管，指派我与同班学生方思行一起，看管徐献瑜教授。徐是中国计算数学老前辈，当时年近六旬，作为老燕大数学系主任，曾跟司徒雷登交往甚密，当然难逃“美国特务”之嫌。徐被隔离审查在29楼二楼，一间朝北的学生宿舍。工宣队安排我睡他上铺，24小时寸步不离地跟随他，唯一的任务是防他自杀。徐个子很高，体态比较单薄，略有谢顶，但腰板笔直，心态很好，一点看不出大难临头的样子，每晚熄灯不久就酣然入睡。我睡眠不好，很是嫉妒。我完全不了解案情，每天只是从早到晚寸步不离地跟随他，最远的路是从29楼到大饭厅打饭。几个月下来，对话几乎为零。我很快就相信他不会自杀了，双方也似乎有了默契。徐在粉碎四人帮后还工作了一阵子，2010年去世，活了整整100岁，创下中国数学家第一长寿纪录。

## 5，《0开新字》

张承先工作组撤走后的校文革执政时期，数力系成立了宣传组，承办油印小报《开新字》，设在29楼二楼东头两个房间，成员来自全系各个年级。印象比较深的有65级李涛和倪尧范，62级罗伟民等人。1967年春，学校开始分派。我们几个都反感聂元梓，观点接近相对温和的0363北京公社，索性集体加入北京公社。北京公社简称0派，为区别旧报，我们在新报题头“开新字”前加盖了一个十分醒目的红色图标“0”。小报自然多了一项新内容——批判聂元梓，反驳保聂的新北大公社。新报分为两部分：我负责前半部分的官样大批判文章，后半部分批聂，由罗、李二人操刀。罗文笔极好，典型鲁迅笔法，平和的说理充满幽默。每期小报除在29楼附近张贴，还贴校园的几个主要宣传点。新版《0开新字》吸引了不少读者，我们颇有成就感。贴在外面的小报常有钢笔留言点评，赞扬居多。但有一次见到一则写在小报红色图标“0”旁的评语：“大批判+内战=0”，至今难忘。整整17年后的1984年，我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亚洲图书馆意外发现那里藏有多张《0开新字》油印小报，给远在他乡的我带来惊喜，兴奋之情无以言表。第一版正是我刻写的批判刘少奇的官样文章，其中“刘少奇”三个字上打了叉，“少”字还是倒过来写的。1977年复旦大学数学系先于全国进行研究生招生试点，罗伟民成功考取谷超豪的研究生，本该与我同行，憾因家庭困难而放弃了读研机会。李涛定居日本从事桥梁设计工作。办小报《0开新字》，成为我在北大文革四年中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我的井冈山观点相对温和。正义感而已，不赞成极端行动。眼看着大好青春时光流逝，不免心慌，总惦记该学点什么。首先想到的是学英语。我辗转淘来一本同济大学专为学过俄语的人设计的英语教材，从国际音标学起，向班上会英语的陈瑞中等同学请教音标发音。没

过几天，1968年3月29日凌晨，我从梦中惊醒。我住29楼四楼，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手持长矛责令我们离开。我懵然不知发生了什么，空手跑下楼后才明白：短期内回不去了，只好请公社的同学把我的衣物拿下来。在北京游荡几天后，决定回长春，趁机把英语拿下来。我把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英语书读个遍，创造了奇迹：三个月后，当工宣队进校通知学生返校之时，我已能熟练阅读英语文献。这份20岁黄金年龄自练的“童子功”，使我终身受益。八年后，凭这点自学的英语本事，进入三机部133厂，作为骨干参与翻译从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引进斯贝航空发动机制造的海量图纸和工艺工程，接着继续作为骨干到北京628所承担翻译出版一批《美国军用标准》，算是为中国国防现代化起步尽了微薄之力。1977年恢复大学及研究生考试，迎来人生转折。我同时报考了吉林大学数学研究生和北大回炉班，以求双保险。两个都轻松录取：回炉班考试名列前茅，一天课也没上过的英语竟得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很高分数。

## 6，过把红卫兵瘾

文革的极左路线把“血统论”演绎到极致。1966年6月1日广播大字报不久，我和班里另外两名团支委就被群众免了职，仅仅因为我们出身非“红五类”。接下来的破四旧等极端行动，都是红卫兵们干的，家庭出身不达标者没有份儿。谭力夫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北大没兴起来，除了明显不在理，大概也因为北大学生中真正根红苗正者并不多。但出身好就有底气，出身不好就受压抑，却一点都不含糊。其实，我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解放前就是进步知识分子。没有道理可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受信任，也就少了干坏事的机会。我在北大的文革岁月绝对清白，没沾过任何专案的边，更不用说整人、打人了。想不到1969年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出现戏剧性一幕：上级把首都二十周年国庆游行队伍最前面的 $20 \times 20$ 红卫兵仪仗队任务交给北大。9月初的一天，工、军宣队通知全体男同学到东操场集合，按身高排队，二话不说，由高至低截取前400名，居然不问家庭出身。我身高1米73，从容入选。想来，那天入选红卫兵仪仗队的受宠若惊者，肯定不止我一人。在8341部队教官指挥下，操练了一个月。国庆游行那天，每人领到一支红卫兵袖标，印有“红卫兵”三个毛体黑字，醒目而精致。原本连普通红卫兵都不沾边的我，居然成为红卫兵仪仗队的一员。当我佩戴标准红卫兵袖标昂首挺胸正步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不无激动：坦言过了一把红卫兵瘾，还是官方认定的呢。

## 7，力学一班三人行

1970年3月毕业分配的消息很突然，想不到会这么快离开北大，而且是从偏远的653分校直接走人，心有不甘。班上同样不甘心的至少还有戴耀和翁天祥等同学。离校前三人惺惺相惜，互赠专业书留念、共勉。四十多年后翁天祥回忆说，当时我送给他的是一本英文版常微分方程，他全都读完了。戴耀幸运留校。我和翁天祥则分别分配到辽宁昌图县东嘎公社中学和贵州兴义县化肥厂。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8年，班里考取首批研究生的恰好就是我们三人。翁天祥考取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毕业留台工作，从事卫星轨道计算。戴耀考取清华大学工程力学专业，成为黄克智院士培养的首位博士，任教解放军装甲兵学院，断裂力学专家。我考取吉林大学基础数学专业，师从伍卓群教授，研究方向非线性偏微分方程，获硕士、博士学位，任教大连理工大学。翁天祥的专业涉及常微分方程较多，1983年春写信邀我合作改进常微分方程中关于Liapunov稳定性的经典定理。我知道深浅，没敢接招。1990年代，我与翁天祥相继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访问工作，我在应用数学系，他在天文系。访问期满，年过半百的翁天祥选择在美国“下海”，进入IT行业。他对计算机硬件算法研究独有建树，踌躇满志，至今还在奋斗，发誓要拿下计算机领域的最高奖——图灵奖。



我们仨算有幸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比较远。也许并非偶然，从临别互赠专业书即见端倪。其实，我们仨最大的共同点是：1978年考研究生时，虽已过而立之年，却都还单身，又都是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才成家，孩子同岁，被其他老同学几乎拉下一轮。

（作者简介：郑斯宁，1946年11月生于重庆。1965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1970年毕业，分配辽宁省昌图县东嘎公社中学。1981年起在大连理工大学任教。数学教授、博导。2017年退休。）

□ 来源：《风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张从、奚学瑶、郑振卿主编，中国传记出版社，2018年2月

~~~~~

【亡灵祭坛】

1966“8·18”：北京城死了多少教师？

· 王培尧 ·

题记：“文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运动？在“两条路线斗争”幌子下，普通人遭遇怎样悲剧？新世纪一代并不是很了解。笔者根据《草根教书匠的BLOG》纪实日记整理成本文，可以结合搜山东莱子《1966年8月8日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参考阅读，了解“文革”来龙去脉。

49年前1966年8月18日，“红色恐怖”的北京城。天安门广场百万红卫兵盛大集会，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红卫兵挥动小红书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红卫兵代表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彭小蒙（毛泽东8月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发表讲话。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名字后说，“要武嘛”。彭小蒙宋彬彬在天安门的位置让全世界瞩目。《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注明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改“红色要武中学”。

“8·18”后，公安部长谢富治下达指示：各公安分局派出所向红卫兵提供所管辖区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名单供红卫兵揪斗，号称“红色恐怖”，红卫兵称之“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红卫兵用皮带棍棒拳脚灌墨汁泼凉水砖头打砸。“阶级敌人”被铁丝挂铁牌子挂破鞋，戴垃圾桶改装高帽子游街，许多教职工学校领导死亡，有的被推下教学楼。死亡之后被冠之“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

1966年8月，全国所有中小学都发生了暴力迫害。据官方资料文统计文革十年北京冤狱死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折磨致死自杀超过一万人。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五百至一千人。陕西安康县文革非正常死亡一千三百人。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株连达到一亿人。去台人员家属冤假错冤多达十多万人。文革非正常死亡二百万人。

1966年8月5日，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是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五人同时被毒打。三、四个小时用带钉子木棒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身上有几十处血窟窿最后致死。另外四人骨折重伤。

8月13日，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万福身带遗书投龙潭湖身亡。8月28日，中文系教授刘盼遂和妻子梁秋色（家庭妇女）在西单家中被打死。中文系教授叶苍岑和妻子在西单教工宿舍内遭毒打，妻子被打死。

8月17日，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在煤渣铺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膝盖鲜血淋漓。红卫兵穿着军用皮鞋踩碾女教师手指。陈葆昆被迫害致死。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红卫兵开批斗会，北京教育局和三所中学领导二十多人跪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舞台上。八中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浑身是血，脖子上套着绳子，绳子另一端牵在骑自行车红卫兵手里，从两公里外一路跑到中山公园。教育局长孙国梁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

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红卫兵打死教员张辅仁张福臻。为了试验死亡红卫兵用冷水浇用开水烫，尸体无反应才罢手。该校有二百名教职员，红卫兵声称是“杀二儆二百”。

8月19日，北京三中（后改名159中学）红卫兵用皮鞭和带钉子的木棍殴打校长沙坪。20日上午，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十多名教师“陪斗”。红卫兵（女生）薅下沙坪的头发，令她抬起头来，地上一堆头发一摊血迹。在全校师生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致死。校长熊易华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四块砖头，额头被打破。数学教师张梅岩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瑾自杀。此后，打死沙坪的红卫兵在西城区委大院里挥舞铜头军用皮带打人。

8月19日，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遭到毒打。20日早晨王庆萍坠楼身亡。王庆萍有三个孩子，大儿子说妈妈是被推下楼去或者被打死扔下楼去的。如果自杀妈妈会给我们写信留话。

8月22日，北京八中学校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败血症终身致残。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自杀。22岁初一班主任赵尊荣被剃“阴阳头”。

8月24日，北京十一中化学教师唐婉森（女）被抄家，红卫兵用木棍把唐打死。8月26日，红卫兵给老教师剪“阴阳头”，在操场焚烧图书馆藏书。强迫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推到火堆手臂被烧伤，40年后伤痕犹在。图书馆员沈世敏（女）剪头发在火堆边被烧伤，医院拒绝治疗。沈当晚在家中上吊自杀。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在家中上吊。校医霍岐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服毒。学校有八人被害。

8月24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派卡车运送12所中学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殴打清华大学领导人和教授。无线电系教师干部被打血流满地，红卫兵围绕血迹画了圈写“狗血”两个大字。傍晚，红卫兵拉倒“清华园”牌坊（现在的牌坊是文革后重建）。红卫兵挥舞棍棒皮带命令教授干部搬石块。水利系教授黄万里被剪“阴阳头”，跪在地上被打被勒令搬石块。夜里，清华大学清华附中校级干部关“科学馆”，逐个拉进小房间拷打。

8月24日，北京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员鄂少琪（女）被揭发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言论，跳河身亡。永定门小学教员冯杰民被批斗用剪刀自杀。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赵谦光被侮辱殴打从烟囱上跳下身亡。该校校长白智（女）被学生按一脑袋图钉。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二中红卫兵打死语文教员靳正宇，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女）。校长高云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用沸水浇。

8月25日，北京二十六中红卫兵斗争46名教师。校长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上，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自杀，年42岁。该校工作组长李淑铮（女）遭毒打喝杀虫剂自杀，送进医院救活。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李培英（女）被打，8月27日在关押房间暖气管上吊死。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彭鸿宣被打自杀。

8月27日，66岁退休教师贺定华（女）被红卫兵剪掉头发自杀。丈夫姚剑鸣被毒打驱逐到安徽宿松县梅墩乡，1968年7月上吊身亡。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赵香衡（女）遭殴打和丈夫沙英跳楼身亡。北京芳草地小学校长石子勤遭殴打侮辱用剪刀戳脑自戕未死。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王启贤老师被强迫吃煤渣。玉泉路小学四名女教师被剃“阴阳头”。

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女）教导主任吕贞先（女），在同一天内被打死。郭文玉丈夫孟昭江遭毒打，两天后死亡。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邱庆玉（女），10月1日打死。

8月27日晚，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俄语教授张剑飞被从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被毒打至夜里12点，送海淀公安局关押。张剑飞肋骨断尿血呼吸困难，9月5日死亡。该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孙启坤（退休会计）逃出学校，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南文昌胡同六号弟弟孙菊生家中，被红卫兵打死。

8月30日，北京戏剧学校教员，京剧演员叶盛章遭红卫兵毒打，东便门护城河投河自杀。学校校长江枫（女）被殴打侮辱回到家中遭14岁养女殴打，自杀。

9月8日，北京二十五中，语文教师陈沅芷（女）被推到叠起来的两张桌子上，红卫兵把桌子推翻陈沅芷摔下来。陈被关押致死。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师郑兆南（女）饱受殴打折磨，1966年9月8日致死，36岁。

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毒打生物教师喻瑞芬（女），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把沸水浇在身上两个小时死亡。所有“牛鬼蛇神”绕喻瑞芬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喻尸体。

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中学（文革改名138中学）红卫兵用沾水麻绳捆绑和用铜头皮带把负责人张冰洁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中国人大附属中学教员杨俊被打死，教员郑之万（女）跳楼自杀。

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遭殴打在学校办公楼厕所水道上吊自杀。红卫兵给教导主任姚淑嬉（女）剃头发，强迫她和别的老师把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四条腿之间，强迫姚淑嬉和学校其他干部老师抬刘桂兰尸体。

北京朝阳女子四中（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被毒打致死。校长潘基（女）被打。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文革改名157中学）教员孙迪被打死。校长陶浩（女）手被打骨折残疾。

北京第四十九中学语文老师郑育秋（女）“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伤全身肿烂，抬到第四医院（现恢复旧名叫普仁医院）医院拒诊，死在医院走廊石板地上。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马耀琮被打死。

北京月坛中学校长萧静（女）被打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体育教员曹天翔语文教员董尧成（女）被殴打侮辱跳楼自杀。北京65中化学教员靳桓跳楼自杀。北京四中地理教师汪含英（女）被剃阴阳头，和丈夫苏庭伍在香山服“敌敌畏”身亡。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校工马铁山上吊身亡，英语老师傅敏投水未死。

北京四十七中美术老师白京遭毒打投河身亡。北京三中语文教师石之琮（女）龙潭湖投水身亡。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员朱鸿志毒打上吊身亡。房山县房山中学校长王哲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老师跪在王尸体前面继续斗争。北京通县一中负责人程珉遭斗争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生物高老师割破动脉自杀。

北京二中一级数学教师路彦被驱逐农村后死亡。地理教师袁之俊和自杀。红卫兵把工人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头朝地扎下水泥地上死亡。北京十一女子中学（文革改名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毒打跳楼身亡，一名男工友跳楼自杀。清华园中学校长项凯被关押校中。该校军体老师李凯跳楼身亡。

北京十九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看到别的老师被剃阴阳头，在宿舍用绳子自杀，三十多岁。初中化学老师阎凤卿（女）父辈开照相馆（颐和园照相馆），红卫兵认为老照片是“封资修，被抄家。阎凤卿被关在放扫帚簸箕的黑屋里自死，二十多岁。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生琯，被红卫兵被从楼梯上推下摔死。支部书记孙树荣眼睛被打瞎。北京翠微路中学校长黄国英眼睛被打瞎。北京三十一中党支部书记宋克毒打关押，8月30日服安眠药自杀未死。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批斗精神失常，红卫兵说装疯卖傻。李玲善七十年代走失。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安丰均被打断三根肋骨。

◇ 附一：1966年“红八月”北京大中小学校被打死教师职工领导统计数目（1772人）

8月24日，打死44人；
8月25日，打死86人；
8月26日，打死126人；
8月27日，打死228人；
8月28日，打死184人；
8月29日，打死200人；
8月30日，打死224人；
8月31日，打死145人；
9月1日，打死228人。

◇ 附二：1966“红八月”北京中学校教师职工领导死亡名单（部分）（61人）：

▲ 被打死名单（部分）：

郭兰蕙（女）清华附中学生学生
卞仲耘（女）北师大附中副校长
梁光琪（女）北京 1 5 女中书记
刘美德（女）清华附中副校长
刘树华清华附中教师
陈葆昆北京 1 0 1 中学教师
张放（女）北京二龙路中学教师
张辅仁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
张福臻北京外国语学校职员
沙坪（女）北京女 3 中校长
张梅岩（女）北京女 3 中教师
何世瑾（女）？
华锦（女）北京 8 中负责人
申先哲北京 8 中教师
唐婉森（女）北京 1 1 中教师
沈世敏（女）北京 1 1 中图书馆员
靳正宇北师大附 2 中教师
姜培良北师大附 2 中书记
樊希曼（女）北师大附二中学生曹滨海母亲
陈沅芷（女）北京 2 5 中教师
郑兆南（女）北京 5 2 中教师
喻瑞芬（女）北师院附中教师
李锦坡北京景山学校工友
张冰洁（女）北京白纸坊中学负责人
刘桂兰（女）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
姚漱喜（女）北京外国语学校教导主任
杨俊人大附中教师
郑之万（女）人大附中教师
齐惠芹（女）北京朝阳区 4 女中教师
孙迪北京 1 0 女中教师
哈庆慈（女）北京 1 1 女中教师
郑育秋（女）北京 4 9 中语教师
王光华北京 6 中学生
徐霏田北京 6 中退休工友
何汉成北京 6 中附近居民房产主
王生琯北京 3 0 中校长
易光轸北京 5 2 中副校长
张以撒北京 4 9 中教师
江枫（女）北京戏校校长
叶盛章北京戏校教师
高云北师大附 2 中校长（火葬场待焚时醒活）
杜光天（女）北京 3 3 中负责人（火葬场待焚时醒活）

▲ 自杀者名单（部分）：

高万春北京 2 6 中校长
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

彭鸿宣北京工院附中校长
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
曹天翔北京女2中教师
董尧成（女）北京女2中教员
靳桓北京65中教师
汪含英（女）北京4中教师
苏庭伍北京4中教师
马铁山北京女1中工友
傅敏北京第1女中教师（获救未死）
白京武北京47中教师
石之宗（女）北京3中教师
朱鸿志北京矿院附中教师
高老师北航附中生物教师
袁老师北京2中地理教师
许师傅北航附中电工
宋克北京31中学书记（获救未死）
李玲善北京回民中学校长（失常走失死无寻所）

▲ 1966年“红八月”北京市小学校教师死亡名单（部分）（12人）：

王庆萍（女）梁家园小学校长兼书记
鄂少琪（女）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员
冯杰民永定门小学教员
郭文玉（女）宽街小学校长
孟昭江郭文玉丈夫
李荫福宽街小学教师
吕贞先（女）宽街小学教导主任
邱庆玉（女）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
赵谦光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
赵香衡（女）史家胡同小学校长
沙英赵香衡丈夫
石子勤芳草地小学校长（自杀获救未死）

◇ 附三：北京大学1966—1968年教师死亡名单（20人）：

历史系教授汪篾喝敌敌畏自杀。
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自杀身亡。
西语系教授吴兴华遭强喝污水后当晚死亡。
英文教授俞大綱遭抄家殴辱后，在家中自杀身亡。
中文系书记程贤策遭侮辱毒打后自杀身亡。
哲学系教授沈乃章遭斗争羞辱后自杀身亡。
北地附中学生温家驹，因进入北大图书馆翻阅期刊，遭审讯毒打致死。
古代史教员李原遭关押当晚死亡，尸身伤痕累累。
化学系职员林芳自杀身亡。
生物系教授陈同度服毒自杀身亡。
教务长崔雄昆在红湖游泳池自杀身亡。
物理系教授饶毓泰在燕南园51号上吊身亡。
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隔离审查中自杀身亡。

历史系办公室主任吴伟投圆明园小湖自杀身亡，死后开批判大会。
历史系主任教授、副校长翦伯赞夫妇自杀于燕南园 6 4 号。
东方语言系教师汤家汉被审查期间自杀身亡。
西语系德语专业干部徐月如自杀身亡。
西语系德语专业教师程远自杀身亡。
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教师蒙复地自杀身亡。
数学系老师张景昭被关押某夜里死在厕所里。

◇ 附四：清华大学 1 9 6 6 — 1 9 6 9 年死教师亡名单（2 7 人）：

数学力学系学生张怀怡因被控有反动言论遭斗辱跳楼自杀。
员工罗征启弟弟罗征敷无辜遭抓捕毒打闷死。
无线电 0 1 班学生孙华栋被抓遭毒打致死。
自动化系自 9 4 班学生谢晋澄武斗中遭汽车压死。
冶金系焊 8 2 班学生许恭生武斗中遭长矛刺死。
化工系 0 0 3 班学生卞雨林武斗中遭箭射死。
修建队工人段洪水武斗中遭长矛刺中摔死。
统战部副部长刘承娴在关押被审查期间坠楼身亡。
建筑系房 0 1 班学生朱育生在武斗中挖战壕时中弹身亡。
动农系实验员杨述立武斗中开装甲车时中弹身亡。
自动化系自 8 2 班女学生钱平华在武斗期间路过主楼中弹身亡。
工宣队队员潘志宏在制止武斗时被手榴弹炸死。
工宣队队员王松林在制止武斗时被手榴弹炸死。
修建队工人范仲玉在武斗中被手榴弹炸死。
外校学生范崇勇在武斗中被手榴弹炸死。
工宣队队员韩忠现在制止武斗时被长矛刺死。
工宣队队员李文元在制止武斗时被开枪打死。
工宣队队员张旭涛在制止武斗时被长矛刺死。
水力系教授陈祖东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圆明园自杀身亡。
外语教师杨景福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跳楼自杀身亡。
基础课讲师的殷贡璋、王慧琛夫妇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香山自杀身亡。
水力系教授李丕济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跳楼自杀身亡。
机械系教授邹致圻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跳楼自杀。
土建系讲师程应铨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投水自杀身亡。
体育教师路学铭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跳楼自杀身亡。
图书馆职员李玉珍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跳楼自杀身亡。
电机系助教王大树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服毒自杀身。

□ 来源：《博客中国》网站

~~~~~

【研究评论】

文革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下）

• 杜钧福 •

（上接 z k 1 8 1 0 c）

#### 四、造反派没有完全失败

虽然清华附中红卫兵写出了“三论”革命造反的大字报，后来的舆论一般不认为他们是造反派，因为他们所反的是真正处于弱势的学校里的领导和教师。聂元梓虽然算作造反派，但在当时也有很多人不予承认。实际上，从他们的“造反”到1966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正的造反派兴起之间，有一个平滑的过渡。在6月初，一些后来威名赫赫的造反派领袖蒯大富、高树华、李世英、王洪文等人所造的反，除去他们所采取的形式以外，也很难符合造反一词的本义，也就是朱学勤先生最近所说的“假造反”（《造反派，真的反了吗？》，爱思想，2016）。直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展后，斗争矛头所指有二：一是批判血统论，二是清理“黑材料”，批判将群众划分“左中右”、肆意打成“反革命”的作法，才恢复了造反一词的本义。

这是因为，这两件事矛头所指，是文革前的党支部专政体制下的身份等级制度和出身等级制度。身份等级制度，是在政治运动和政治生活中，将党支部所管辖的人群按照政治立场和与支部的亲疏划分为党员、团员、积极分子、一般群众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予以区分对待，而以打小报告即告密作为划分的根据和运行的机制。出身等级制度是指按照成员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决定信任程度和在政治运动中的位置。这两者在文革前都是暗箱操作的，名单十分秘密，在文革开始后暴露出来，成为动员群众造反的重要原因。

在这两个问题上，造反派实际追求的是平等权利，是应当肯定的。正如一篇评论内蒙造反派领袖高树华的文章（伍国《一本值得一读的文革回忆录》，共识网，2014）所说，他造的是基层党组织的反。俗语云，县官不如现管，群众只能根据切身体会，反抗那些日常压迫自己的基层干部，不可能对国家政治有更高的要求。至于什么巴黎公社的理想，只是一种空泛的概念，缺乏任何实现的具体途径，也只限于少数造反派领袖和先进分子的追求。

“文革前的十七年形成的思想禁锢绝非只是一层铁幕或一只牢笼，而是层层叠叠多层次多重多方面的，而且这些桎梏并非以暴力为背景强制施加给我们的（除极少数人之外），而是在接受教育的形式下我们自愿接受形成的。因此，在文革中人们开始破除思想桎梏是只能从最低的层次开始，而不能指望一下子就完全摆脱十七年甚至更长久以来形成的思维桎梏，达到完全的独立思考与思想自由。”（沈昆《否定文革面面观》，孙怒涛编《良知的拷问》）

我们看，造反派造反图的是什麼？造反派的最低政治纲领，即沈昆说的最低的层次，就是不要再区分左中右，不要随便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这种造反的局限性导致他们夺权之后除去继续维护既得权益以外，无所作为甚至走向反面。

但是，造反派这种最低政治纲领实现了没有？

尹保云教授近年说：“现在基层党组织松散化，长期不活动，活动也是走形式，基本上瘫痪了。共产党原来的体制是基层组织活动积极，通过基层党员起骨干作用，把群众全抓住。现在的基层组织不行了，市场经济让它瘫痪了。这应该说是正常的发展趋势。美国、日本、韩国的政党，基层组织也十分松散，多数只是在选举时才有些活动。我们目前的基层组织松散，正是顺应了发展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按照以往思路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那就错了。总之，市场经济要求党必须转变，不变不行，这是历史趋势，谁也阻挡不了。”

（《走出“封建”社会，迎接现代文明——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尹保云教授》，《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2011）他说的对，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因果关系似应颠倒。早在文



革期间，党的基层组织就瘫痪了。所以说，文革中的党的基层组织的瘫痪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从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被否定。这种体制适合战争期间，但变为执政党以后就成为控制社会生活的工具。但迄今为止，都把这一变化当作一件坏事评价。

造反派在文革初期对基层党组织的冲击无疑对党组织的瘫痪起了重要作用。在党组织的瘫痪被认为是一件坏事时，都说是造反派干的；如今这个“松散化”被肯定时，又异口同声说和造反派无关。

党组织的瘫痪带来了党支部专政体制的崩溃，特别是身份等级制度的结束。在文革期间，党组织瘫痪以后，代替掌权的依次是红卫兵、造反派、革委会和工宣队。其中，工宣队和军宣队力图恢复文革前的秩序，但都不成功，在群众中未形成相对固定的等级结构。文革后期党组织恢复了，但已不是当年的党组织了。“这张由中共各级党团组织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织成的巨网，一旦破坏就再也无法重新织成了。”（木戈《文革风云映滇池》，民间历史，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根本原因是，当年的党支部专政体制所依赖的还有信仰和欺骗，也就是沈昆所说的“自愿接受”。皇帝新衣的童话一旦被揭露，就很难恢复本来面目了。

基层党组织的瘫痪肯定与造反派冲击有关，但又不仅是造反派冲击造成的，这种情况的出现适合了当时的社会变迁。

追溯这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变迁，就是从党派政治到领袖政治再到家族政治。中共八大是党派政治代表。随后，毛泽东逐渐垄断了党内话语权，发展成领袖政治。在文革前夕，另一种政治冒出苗头，就是家族政治。反右以后，党组织的威信如日之中天。但是到了“四清”运动，工作队进村后均代替原有党团组织。文革开始后，上级党委向文教单位派驻工作组，也是按照四清的办法行事，党团组织不再活动。这些单位的党委领导往往被打倒，未被打倒者不敢也没能力领导运动。此外极端的阶级路线也削弱了党的领导。从四清运动开始，重视阶级出身而不再重视是否党团员。在文革中，又将这样的极端阶级路线推向极致，如后来的红卫兵所做的那样。而且，由于大力提倡对毛泽东个人的迷信，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迅速提升，党的威望相对下降。从反面来说，反党的罪过已不抵反毛泽东的罪过。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最厉害的罪名是“三反”（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恶攻”（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使昔日右派分子的“党天下”和“政治设计院”相形见绌。

最重要的是，由于文革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各级党委同仇敌忾，一致对敌的局面不再。当群众运动以空前的气势汹涌而来时，一些领导为了自保，往往将同为党委成员的同事抛了出来顶缸，即所谓“舍车保帅”。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它使各级党委成员离心离德，严重削弱了党委的领导能力。当然造反学生的出现，党群关系出现新的变数，情况更为复杂。从领导到普通党员，观点及立场发生原则分歧。党和党员的威信、作用均受到严重挑战。

在后文革时代，完全转化为家族政治。原来党组织本身是个大利益集团，现在缩小到“红二代”及围绕他们的各路精英。基层党员得不到什么好处，自然使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失去了驱动力。从这件事来说，历史上的事件很难在好/坏的一维价值坐标上讨论。

在文革初期，很多文革领导人阐述了这种新的党的领导概念。陶铸、陈伯达、戚本禹等人多次强调党的领导就是党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谁执行党的政策，谁就是党的领导。

这种关于党的领导概念泛化的提法，使党组织和党员头上的光环在瞬间消失。既然掌握运用了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则政治不再为党支部和少数积极分子的专利，人皆可为舜尧。这极大鼓舞了普通学生和其它人员参与运动的积极性。

这种新的党的领导的概念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理论，类似于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孟什维克所主张的观念，也是第二国际社会党所实行的制度。在文革期间，这种理论为建立新型的党群关系提供了理论根据，也是中共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思想资源之一。

所以，就这一点而言，造反派的基本政治诉求得到实现，造反派没有完全失败，它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尽管很多造反派领袖在文革中和文革后遭到迫害。从文革后期开始，在基层就不再进行划分左中右的政治排队，也没有听说什么人被党支部打成反革命，老百姓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生活空间，不再在政治学习会上说些言不由衷的假话。政治迫害当然还有，但与文革前不可同日而语。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整个社会世俗化进程的开端，和文革初期对当权派的冲击相联系，尽管不一定是造反派的初衷。但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大抵都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解读。每一历史事件都不是单纯的、孤立的，都和其它事件交织在一起。

## 五、何为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尊崇普世价值。但一些自由主义派学者说他们的普世价值观念是文革后才有的，就是说从西方学来的。他们中一些人倡导从普世价值角度总结文革，但又极端蔑视群众的力量，因而除去不断重复当局所做的彻底否定文革的结论外，没能有什么建树。当然他们和当局还有不同：他们是真正完全否定文革，而当局所否定的，主要是造反派的造反运动。

我认为普世价值应包含在人类一切先进思想资源之中，也与中共历史上一些宣传口号不悖。资中筠则将自由主义与中国古代的“道统”相嫁接。（《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炎黄春秋》2010年9期）马立诚则说：“谭嗣同、秋瑾的牺牲，已经不是为了维护原来儒家的道统，而是为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东方出版社，2015）均认为“古已有之”。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贡献是对其理论化和找到了实现这些价值的可行途径。

秦晓先生说：“……现代性固然是一个由学者定义、阐释的概念，但就其内容来说，在最本质的层次上，她是人类共同的想法，来自非常自然的人性，或非常自然的人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普适性不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抽象性，而是因为无论哪里的人都很容易认同这个概念。”（《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人们都说，红卫兵一代是“狼奶”喂大的，这不错。尤其是1957年反右斗争，在55万右派分子中，中小学教师占了25万。这些被迫离开教学岗位或遭受劳改的右派教师绝大部分是有教学经验、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老教师。反右和其他政治运动实际是我国教育体系的一次历史性浩劫，造成文化传承的断裂，也造就了红卫兵一代。

但是。“狼奶”一说也不全面，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是很容易被消灭的。上海复旦大学红卫兵领袖安文江叙述他参加造反所依据的思想资源时说“我这个人受家庭影响和西方书籍熏陶，人情味很重。”（《我不忏悔》，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领袖蔡新平说：“虽然那年头我们还不知道普世价值这个词，但善良之心，同情之心，人道之心（那年头人道主义要加上‘革命’两字才可以说）本来就是普世的。是非善恶，良心不泯，大有人在。”（徐海亮《读〈王大宾回忆录〉随想》，《记忆》145期，2015）

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后参加造反派的王继志说：“我们家是一个传统的书香门第，我从小受到过传统教育的灌输，‘忠’、‘孝’观念特别强，另外就是对老师非常尊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所以‘文革’时期我参加造反，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传统‘忠孝’观念的影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忠，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但是‘文革’期间我没有批斗过我的老师，更没有参加过‘打砸抢’。我的早期教育背景不允许我那样做。”（董国强《文革中的造反派都是些什么人》，共识网，2014）

文革中的一则典型事例，是北京农业大学附中高中三年级二班的两位学生刘握中和张立才，以伊林·涤西为笔名在清华大学贴出的名为《给林彪的一封信》的大字报。至今，这张大字报作者仍被舆论誉为“反林彪”的先锋，实则是对该文意义的曲解和贬低。其实，大字报作者对“敬爱的林彪同志，我们的副统帅”还是非常尊敬的，并寄托以希望。他们说，之所以发表公开信，是出于“促进人民大众进一步取得您所提出的批评监督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大自由’。”这种立场代表了当时一些后来称为新思潮的人物的特点，就是不以打倒或支持某一干部为目的，不纠缠派别斗争，而专注于思想的探讨和社会改革的任务。他们将自己和国家领导人放在平等的地位探讨问题，这种意识的高度已经超越了彭德怀这种海瑞式的人物。这显然是一种现代意识。

我说说自己在文革中的体会。1966年12月5日晚上我旁听过一场在林学院一间教室里举行的辩论会。辩论以李洪山和两位清华大学学生为一方，其余与会者主要是外地来京中学生红卫兵为另一方。辩论内容无足道，但是令我惊异和感受颇深的是另一件事，就是有很少数参与者不是据理反驳，而是给李洪山扣上“反中央文革”、“反革命”的帽子时，遭到与会群众的一致谴责，虽然他们激烈批判李洪山的观点。我当时很兴奋，感觉这种自由讨论的空气正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成果，就是绝不容许任意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管他持什么立场。要保护每一位辩论者的原则应高于其它所有原则，首先尊重的是程序正义。李洪山是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但是这个运动的宗旨就应当包括保护李洪山这样的反对者。这些比我小十来岁的中学生红卫兵没有直接受过西方自由民主风气的熏陶，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持这样的宽容立场。

在同一时期，中国科技大学的“雄师”战斗组给中央文革贴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作者之一的周平后来说：“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文化大革命要有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要让不同见解的人有平等的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把抓起来的学生释放，让不同观点的大字报自由鸣放，不因言论治罪。”（周平《“雄师案”和我的命运》，《炎黄春秋》2015年5期）1967年1月，公安局到科大抓捕“雄师”五名成员的时候，遭到该校千余名群众的阻挠，双方对峙两小时之久。尽管明确表述这种追求自由意见的人是少数，很多群众是拥护他们的。那种把文革中的群众泛称为“群氓”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偏见。

我们说伊林·涤西是反林彪还是拥护林彪并不重要，他们和林彪争论什么问题也不重要，中学红卫兵和李洪山的具体分歧也不足道，我们重视的是他们的这种姿态、这种立场，这种姿态和立场是超时代的，也就是普世价值的本来意义。

我不反对从西方引进自由主义的学说，但我们必须在我们内部寻找自由主义的资源。正如尹保云教授在讲到启蒙历史图式时说：“美好的事物就存在于人们眼前的现实世界中，是可以实证检验的而不是靠凭空设想的，社会进步应该在现实中的先进单位为参照系。”

（《应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炎黄春秋》，2014年5期）

我认为，自由主义基于多元的价值体系，正如秦晖教授所强调的，它不存在什么基本定理。它应该容许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也应该容许不同的社会发展途径。这当然也是现今所有关心国家前途人士所困惑和纠结的问题所在，就是一个社会转型问题。就此现实问题而言，正如一位左派所批评的：“如此，今天中国自由主义主流的悖论即：找不到实现历史必然性的政治力量。因为这个最大的争民权、要自由的政治力量被他们——作为党官僚的附庸——以‘民粹’、‘动乱’、‘造反’、‘革命’等过滤词汇给滤掉了。他们那种对民众的傲慢和鄙弃，与民主政治家在实现民主前需要大规模地动员民众和民主实现后则为争选票而必须讨好民众，恰成悖论。”（高寒《从文革出发看历史与现实中的若干悖论及几条参照系——回应闲话网友》，《独立评论》，2006）

（作者简介：杜钧福，男，真名王龙。1964年北大物理系毕业，入中科院物理所为研究生，后一直在该所工作，专业为等离子体物理及受控聚变。退休后研究文革史。）

#### ◇ 讨论帖选登

▲ 侯国屏：多年前，我就是杜钧福学长博客的关注者，我敬重他，也比较认可他的观点，他一开始就是一个明确为造反派说话的文革研究者。

后来，他的视野更广，研究的问题我逐渐生疏，有些观点我也不尽认同。但是，这次我又见到了久违的杜钧福。

造反派们面对历史的确也不必那么沮丧。你们并非一无是处。你们的历史功绩永远无法抹杀。反党支部就是反党的铁律是经你们手被永远粉碎，它不可能再复辟。也正是由于你们的行动，1957年的右派才最终得以平反，尽管你们并无介入这一平反。但是，那是水到渠成的事。

文革是必须否定。但没有文革，那几百万右派可能得以平反吗？中国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呢？

全面彻底地否定文革似乎是一个共识。但还是应该指出，不同的人所说的“否定文革”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老百姓与当官的不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与后人不同，特别是其中的造反派与当权派看法更不同。

▲ 陆小宝：我认真拜读了杜钧福老师的大作，我认为杜老师的文章提出了几个反思文革中的重大问题。比如：如何评价文革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如何评价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对中国进步的历史作用。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杜老师的文章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课题：反思文革，必须反思文革中流行的思维模式。下面我抄录杜老师文中的一段话：“传统教育告诉我们一个简单模式，它建立一个一维的判断坐标。将个人、社会集团、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在这个坐标上排列，区分为先进革命的和落后反动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先进代表，在先进思想的启发和指导下，按照某种已定蓝图，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和改革，推动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就是如此。现在一些自由主义人士提倡普世价值，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也难于脱离这个藩篱。他们认为，只有他们尊崇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带领下的社会运动，才有所谓积极的意义。而且他们倡导的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种模式，万万不可走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这条路。他们实际上是将书本上学来的一些名词和概念镶嵌在旧的历史观框架内，是一种好/坏历史观的翻版。这确是一种社会进步模式，但不一定能概括所有社会进步模式。历史很难制式化，价值判断体系没有公认的一维标准。所

以我们必须摒弃好 / 坏两元论的思想习惯。承认很好的东西和很坏的东西常常容于一体或溶于一体。两者常常相辅相成，才是理解历史的真谛。”我抄了很长这么一段话，因为它对我深有启发。我对反思文革流行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思考很久了。到美国来接触到“批判性思维”这门学科，我花比较大的功夫去学习它，并试图将“批判性思维”同我们经历过的“文革大批判”相比较。我发现：“批判性思维”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就是我们的“大批判”时期）逐渐确立起来的一门学科，现在是美国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它同我们的“大批判”有许多本质差异，有些甚至可以说同我们的大批判是针锋相对的。批判性思维中提到的一些逻辑谬误，如诉诸感情，诉诸愤怒，非黑即白，虚假两难境地等，都是我们文革大批判中经常用的，今天许多人又用在批判文革上了。

▲ 吴学民：对造反派的评价确实是个很微妙的课题。完全否定，是合官方胃口的。因为当年的走资派恨造反派要甚于恨毛。事实上，绝大多数否定文革的论著都是对造反派进行妖魔化的。但要过度肯定，那就会使得彻底否定文革的结论显得理由不是很充分。造反派当年的使命就是毛的“冲锋队”。他们的矛头是对准走资派的。否定文革，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否定整走资派。最近“左派”出了不少肯定文革的文章，其主要论点就是文革对走资派的冲击是正确的。现在贪腐严重，社会道德溃败都是否定文革的后果。

我认为把矛头指向走资派的就是造反派。造反派不能一律斥之为四人帮的爪牙。他们起来造反很多都是事出有因。总起来说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一个集中爆发。比如在政治上长期受压的地富反坏右，就一般倾向于造反派。他们的利益和诉求与毛的目的在一段时间内正好有了交集，于是得到了毛的支持，在短时间内搞得风生水起。后来毛觉得控制不住他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又动了一根小指头把造反派压下去了。

杜先生的文章涉及了这个课题，我认为是很必要的。但是，文中似乎对造反派起的历史作用有点评价过高，评价过高是不合适的。

▲ 陆元吉：杜钧福先生说：大多数基层造反派以反对政治迫害和政治歧视作为他们的旗帜。这一论断是他文章的立论基础。但我对此有些不同看法。反对政治迫害确实是造反派喊得很响的口号，但并不说明这就是他们的政治主张，更和政治理念沾不上边。实际上他们和权力拥护者一样，也是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狂热信奉者。他们决不反对，甚至不会同情那些“阶级敌人”所遭遇的政治迫害和歧视。他们只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毛路线捍卫者，所以才不应该被迫害。有些造反派也曾短暂掌权，从他们上台后对反对者的迫害，更可充分证明反政治迫害只是他们的斗争手段，而不是他们理性的政治诉求。

杜先生所关注的基层支部变迁，确实有一定意义。基层党支部是极权体制的末端，也是体制运转的基础。对控制社会和民众十分重要，也十分有效。纳粹有类似的组织形式，斯、毛则借助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将其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不仅控制了民众的行为，也基本控制了民众的思想。文革初期整个党的组织系统陷入混乱，基层支部基本垮塌。这是毛的思路导致的，民众或造反派并没有这样的能力。九大前后党支部又获重建，其作用一如既往，其作用丝毫不逊于文革之前。基层党支部真正陷于松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与公有制的破产关系极大。

▲ 张从：文革中造反派这个概念应该厘清，有各种各样的造反派，各种目的和各个部门的造反派，例如大学和中学的造反派，机关事业单位的造反派，工厂和农村的造反派等，不能一概而论。他们造反的对象也不同，例如聂元梓造的是陆平的反，蒯大富造的是工作组反。应该具体分析。

▲ 陈中平：杜先生的文章充满书卷气，有助于开拓思路，给人启迪。至于文章的具体内容，我有些想法，想和你探讨，陈述如下：

你文中所说造反派的两个目标，反政治迫害和歧视的基本诉求已经实现，党支部专政体制已经基本解体，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造反派中鱼龙混杂，目的并不一致。而且有时也会欺凌弱者，阿Q打不过王胡，就去欺负小D。当时全国就是一个大角斗场，奉行丛林法则，造反派一旦得势，也常常忘乎所以。

总体而言，我是比较同情造反派的，他们文革前社会地位低下，文革中遭受的迫害更加残酷，但是他们的抗争，并没能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

反对政治迫害与歧视的诉求，是在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时，由党内开明派的代表人物胡耀邦主动解决的。由于许多当权派也要给自己平反，解放“贱民”才没有太大的阻力。胡耀邦功莫大焉，而造反派之前的抗争，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或至少没有直接的效果。

文革中各级党组织的垮台，是毛的战略部署，整垮了再重起炉灶。中央文革对党的领导的解释，只是为了突出毛和他们自己的权威。党支部威风全失，只是一种不稳定的过渡状态。一旦重新掌权，不管是党支部，还是军宣队，工宣队，照样威风八面，整起人来变本加厉。清华文革期间留校的师生，应该有更深刻的体会。

至于文革结束后的情况，由于基本国策和工作重心的大转变，党支部的政治作用的确有所减退，变得比较涣散。但是当权派迅即转向变身，在权力～市场媾合的过程中占据先机。也许当年整人训人的架势有所收敛，却增加了强有力的经济控制手段。

现在反腐运动中数不胜数的“虎蝇”，大部分就是从原来的基层干部演变而来的。

至于专政的体制，也可以与时俱进，有兵在，维稳办，610，西城大妈，七省联防，五不搞，七不准，信息员，网络管制……何愁没有手段？

当然，总体来说，社会大环境和气氛，比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宽松，但阴晴不定，常常处于“亚文革”状态，我们不应当悲观，但也不能太乐观了。

▲ 王克斌：我认为造反派不像农民起义，他们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他们是被煽动利用和摆布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因此他们无所谓胜利与失败。打压造反派不仅是兔死狗烹，而且是老干部把愤怒发泄到他们头上。

▲ 杜钧福：我不讳言要为造反派说话，我实际赞成两个文革论，只是认为他们表述不好，我的论点中心问题是文革前的党支部专政体制在文革中瓦解。

这个体制由两个等级制度构成：身份等级制度和出身等级制度，由党支部控制一切成员，政治排队和思想汇报，官面语言是靠拢组织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文革前，这个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靠成员信仰，彼此监督，现在没人信了，那套不灵了。研究历史，三个层次：一为弄清事实，二为追溯因果关系，三才为价值判断。

▲ 沈昆：共产党的专制是层级结构，直接与群众关联的是党支部一级。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放手任下层群众冲击各级党组织的“疯狂”之举（马诺德之语），使群众得以在短期内冲破了各级党组织的专政。成立革委会之后，各级党组织通过若干实质上是对群众（特别是造反派群众）反攻倒算的政治运动逐步恢复其专制，但已经远不如文革前了。

五七年反右之后，不但确立了各级党组织的专制，而且建立了从党支部开始的党组织迷信，把1949年建立的对中共的迷信，强制下放到支部一级。而这种对中下级党组织的迷信在文革中随着冲破各级党组织的专制而被破除了。这应该是中国第二次启蒙的起点，也就是说，中国的第二次启蒙始于文革。

▲ 吕述祖：文革的反思与研究本身应该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杜老师对造反派的研究只是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对文革的研究，并不会偏离防止文革的大方向。

▲ 李子壮：文革中造工作组反的老蒯等其实是反“垄断”。对革命的垄断，414从老团里分裂出来，是反对老蒯对（真理）政治正确的垄断。毛乐看风浪起，直到1967年7·20才发现可能失控，但已经没有发动之时的威信了——吹过头了。

▲ 罗保林：造反派过于笼统，文革初起尤其毛发出造反有理后，造反派是很时髦和光荣的词汇，一时间什么人、什么行动都愿意冠以“造反”！揭批走资派是造反，打砸抢是造反，老红卫兵的破四旧也是造反，……甚至有的小孩子不听家长老师的话也说是造反。因此，笼而统之地以“造反派”掩盖一切矛盾，掩盖历史真相，难道会对文革的反思有什么积极作用吗？

▲ 顾耀文：人都有灵性，天生地有着信仰需求，或称为“宗教情结”，灵魂要有个“锚”才能安生，那怕信仰的是黄金、土地。当然信仰“身外之物”是最靠不住的。

文革时期，一声“造反有理”，天下呼应，尤其青年学生，无不意气风发，冲锋加“横扫”，势如破竹。自古造反皆因有苦有仇，逼上梁山，或因政治野心，欲取而代之，而文革时众多学生并无多大仇苦，更无野心，何耶？除了领袖崇拜，更有种宗教情结，把革命当成宗教时，革命就不需要什么理由了，只为“信仰”。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恐惧，特别是出身背景欠佳的，害怕被主流边缘化，甚至成为革命对象。上世纪初，中国最早的革命先驱多数是知识分子，出自“剥削阶级”，反叛家庭，当属同理。当代世界上一些恐怖组织以宗教为工具，干出不可理喻，反人类之恶行，也是一个道理。当年造反有理一句口号催眠了多少无知青年。一旦天下大乱，什么样的动因就都出来了。“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这句话可以作两种理解：

即使是一朵乌云，也有闪光的镶边相随。

一些光彩闪耀的，其实是朵乌云。

前一种使人在逆境中乐观，后一种让人在狂热中清醒。

◇ 卢纹岱：看造反派是不是完全失败，要界定一个历史阶段。从文革前两年看，是被人利用了造反精神，没有达到反对专制的作用。反而大的造反派自己被囚禁，小的分配后被整，绝大部分成为臭老九受压制。中学红卫兵造反，被利用犯下反人类罪。一个八二四杀死北京市无辜百姓多少人！？毁掉文化古迹多少？！毁掉多少文化珍品？最后上山下乡……。如果从文革十年看，专制更加猖狂，迟谢在清华搞得人人自危，不亚于文革前十七年。从现在看，更是完全失败，文革挨整的大干部官复“原职”后其子弟被分封，父官大其子封大官，父官小其子封小官……直到现在形成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职权拼命捞钱，民脂民膏几乎全部刮进自己腰包。现在哪里还看得见我们所说的造反派作用的一点痕迹？就说基层专制好像是不见了，但是对文艺、舆论的控制更加严重。文革刚刚结束尚有“牧马人”、“渴望”等受人们欢迎的作品。现在又是新才子佳人，美女小鲜肉，帝王将相古装戏统治舞台了，不过形式是电视剧罢了。虽然没有反对党支部就是反党的概念了，但是妄议又是什么？

▲ 孙毓星：我几年前就有幸结识杜钧福（王龙）老师。杜老师作为一位科学工作者从事文革研究多年，文章以严谨、理性、逻辑性强为特色。例如他用“身份等级制度和出身等级制度”概括文革前的体制，其中“身份”依你现实的政治表现为准（如左派还是右派）；而“出身”用来划分“阶级”，区分革命动力还是革命对象，后者已注定属于“贱民”。这种体制人为地将广大群众撕裂成不同的群体，尽管它有时属于隐性存在，但为后来的各种派别分野埋下伏笔。

本篇文章系杜老师专为座谈会而作，主题是评价造反派的历史地位，进而探讨社会发展模式问题，指出：必须摒弃好/坏两元论的思维习惯，承认很好的东西和很坏的东西常常容

于一体或溶于一体，二者相辅相成，才能理解历史的真谛。从这一认识出发，杜老师明确表示：我们和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对文革有不同的评价。

我赞同杜老师的基本观点，但觉得题目还值得斟酌。从文革中到文革后，造反派一再挨整，的确“失败”了，但其反面“成功”又是什么？恐怕说不清楚，因为造反派并没有一致的政治目标。文革初期，造反派充当毛的别动队冲锋陷阵，而后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分分合合，陷入“全面内战”的漩涡，先是激进的一派被抛弃，而文革后两派都被再次清算。

但是，文革初期众多群众起来造反绝不是偶然的，也不能简单归咎于受蒙蔽和个人迷信。他们有着自己的政治诉求。比如，在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书中有拙作“我的文革心路历程”，其中回顾了我当时的心态。1966年8月8日听到广播“十六条”后，“如‘清华文革亲历’所记，当即‘辩论会中止，全校欢腾，连夜游行庆祝’。我反复研读，备受鼓舞。走资派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我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当左派，为反修防修贡献力量。8月10日晚，毛泽东亲自来到群众接待站，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有幸赶上这场最深刻、最伟大的革命运动，一定要紧跟毛主席，不辜负他老人家对我们的信任。我明确了目标，有了底气，再也不怕气势汹汹的老红卫兵查问出身，谭力夫讲话出笼后也敢于理直气壮地批判”。“那时，我感到自己再次获得解放，而且是真正的彻底的解放。毛泽东的号召点燃了我的革命激情，‘造反有理’不再是红五类的专利，谁也不能剥夺我革命的权力。‘革命倍觉主席亲’，我要全身心投入文化大革命，在革命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跟着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回顾这段经历，当年的青年学生虽然脱离不开时代的局限，但大多有理想、有抱负，有精神追求。他们激进、敏感，又简单、幼稚，如马克思所说，容易“轻信”。毛泽东是发动群众的高手，深谙驭人之术。当你被压在底层，甚至掉进“反革命”泥坑时，他一把拉你起来，告诉你：你是革命先锋，向前冲吧。你自然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甚至为之献身。我想许多平民造反派都有类似的心路。”

我参加造反派就源于一种追求平等、自由、民主的潜意识，当然还有通过“表现”来证明自己的革命性，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等幼稚想法。

好几位校友都描述了自己的一段心路。我相信，在毛称之为形势大好，“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的那些日子，即使逍遥派也会有内心的悸动。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五个需求层次，在解决了吃喝问题后，就自然会有高层次的需求：安全、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所以，追求自由、平等，追求民主是人的天性。专制社会使这种天性受到压抑，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反弹，压制越狠反弹越剧烈，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人们关切文革会不会重现时，请不要忘记这一规律。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